

# 美国社会文化危机及其国内、国际政治效应

潘亚玲

**【内容摘要】** 美国在即将迎来建国 250 周年之际正陷入重大的社会文化危机之中。美国的社会文化危机尽管往往被简化为“身份危机”，但事实上是多重危机相结合的产物，集中体现为：人口结构转型导致的白人族裔化发展、平权运动转型以及白人和少数族裔的内部分裂，经济结构转型催生的严重不平等和阶级分化与重组，技术革命爆发加剧的代际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冲突。美国的社会文化危机经过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双重传导，与其在进入 21 世纪后接连遭遇的安全、经济和制度危机互为因果且相互强化。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国内政治效应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通过经济、种族和身份性聚居推动选举地理重构，通过联邦、州及政党的多层次极化加剧“对抗政治”，通过建制化/反建制化、国家叙事和“美国例外论”的重构动摇国家认同。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国际政治效应通过四个渠道传导，即以“反外交”为核心的外交传导，以逆全球化为核心的市场传导，以移民美国为核心的人文传导，以及以虚拟社区为核心的观念传导。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为应对美国社会文化危机而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极有可能加剧美国的“对抗政治”而非“让美国再次伟大”。

**【关键词】** 美国 社会文化 政治极化 霸权衰落

**【作者简介】** 潘亚玲，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云南 邮编：650091）

**【中图分类号】** G1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5)01-0046-19

**【DOI 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501003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先后经历了三场具有历史性影响的重大危机。一是以 2001 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为代表的危机，这导致美国自建国以来所独享的两洋优势逐渐丧失；二是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这一危机不仅引发了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性金融危机，而且明显动摇了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凸显了美国国运逆转的重大风险；三是 2016 年唐纳德·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政治的异常发展，这被视为可能导致美国民主衰败的制度危机。<sup>①</sup>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遭遇如此大规模和系列性的危机，其背后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社会文化危机。美国当前面临的社会文化危机高度复杂，其核心是种族、阶级和代际等问题的多重冲突。美国深层隐性的社会文化危机同时向国内和国际传导，与其表层显性的安全、经济和制度危机互为因果且相互强化。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并启动宏大的政治改革计划，其自上而下的应对危机方式的撕裂效应极可能远超其“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效应，从而导致美国的社会文化危机进一步升级。

## 一、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多重面向

在 2026 年即将迎来建国 250 周年之际，美国事实上陷入了巨大的内部社会文化危机之中，而这一危机又往往被简化为“身份危机”。对筹备庆典的“美国 250”委员会而言，其所面临的困难远远超出物质层面，而是集中在近乎无法讲述单一的全美性故事，或者说难以为高度分裂的美国找到可共享的象征或叙事。<sup>②</sup> 或许这正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最终能够帮助其第二次赢得大选的关键。当然，美国社会文化危机远非“身份危机”这么简单，它事实上包括以种族、阶级和代际冲突为核心的诸多方面。

第一，种族冲突日益复杂。尽管自诩为“种族熔炉”，但美国自建国以来

---

<sup>①</sup> 相关讨论可参见：潘亚玲：《美国政治文化转型与外交战略调整》，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潘亚玲：《美国政治文化的当代转型》，《美国研究》2017 年第 3 期，第 44—59 页。

<sup>②</sup> Beverly Gage, “America is Suffering an Identity Crisis,” *Atlantic*, October 14, 2024,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4/10/america-birthday-national-story/680248/>.

始终被囚禁在种族主义牢笼中无法解脱，白人与少数族裔的关系长期紧张。特朗普在 2015 年宣布参加竞选从而登上政治舞台，直接刺激了当代美国种族主义的回潮，<sup>①</sup> 并推动美国社会从“黑白分明”转向“多色掺杂”，主要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白人的族裔化发展。自建国以来，白人长期占据美国人口的多数。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美国人口的种族多样性日益上升。1980 年，白人仍占美国人口的近 80%，非洲裔为 11.5%，拉丁裔为 6.5%，亚裔仅占 1.8%；到 2019 年，白人的比重已降至 60.1%，拉丁裔增至 18.5%，亚裔也增至 6%，非洲裔增长不多。<sup>②</sup> 由于日渐滑向“少数中的多数”（majority-minority），白人的既有心理优势遭受重大冲击，建构族裔认同及族裔身份的必要性日益凸显。这反过来加快了白人种族优越感的消失，放大了其种族优越地位面临的挑战。<sup>③</sup>

二是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转型。种族人口结构变化也意味着 20 世纪 60 年代启动的平权行动的基础动摇。对白人而言，平权行动不仅意味着他们需要承担祖辈的历史责任，而且意味着随着其人口数量减少而持续加重的负担。因此，白人的“逆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认知持续强化，他们不断呼吁终结平权行动，尤以教育、就业等领域为甚。<sup>④</sup> 例如，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美国国内对大学招生平权行动的抵制力量日益强大。2023 年 6 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平权行动”招生计划违宪，很大程度上暗示了平权行动的黯淡前景，并预示了白人主张其权利的“再平权行动”甚或“后平权行动”的兴起。<sup>⑤</sup>

---

① 相关讨论可参见：潘亚玲：《卷土重来：21 世纪美国种族主义回潮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

② William H. Frey, “The Nation is Diversifying even Faster than Predicted, According to New Census Data,”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1, 2020,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new-census-data-shows-the-nation-is-diversifying-even-faster-than-predicted/>.

③ 潘亚玲：《“白的危机”与美国种族主义回潮》，《东方学刊》2024 年第 3 期，第 35—52 页。

④ “More Americans Disapprove than Approve of Colleges Considering Race, Ethnicity in Admissions Decisions,”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8,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3/06/08/more-americans-disapprove-than-approve-of-colleges-considering-race-ethnicity-in-admissions-decisions/?utm\\_source=AdaptiveMail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23-6-08%20Joint%20affirmative%20action%20gen%20distro&org=982&lvl=100&ite=11937&lea=2492946&ctr=0&par=1&trk=a0D3j000013TUjjEAG](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3/06/08/more-americans-disapprove-than-approve-of-colleges-considering-race-ethnicity-in-admissions-decisions/?utm_source=AdaptiveMail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23-6-08%20Joint%20affirmative%20action%20gen%20distro&org=982&lvl=100&ite=11937&lea=2492946&ctr=0&par=1&trk=a0D3j000013TUjjEAG).

⑤ 寇焜照、王名扬：《美国保守主义政治与大学招生平权行动的终结》，《清华大学教

三是白人内部种族主义立场分化。20世纪60年代开启的民权运动对消除公开的个体性种族主义特别是白人至上主义意义重大。<sup>①</sup> 尽管如此，种族多样性上升首先导致的是白人内部的分裂。一方面，极右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在民主党牢牢控制的地区非常活跃。例如，2020—2023年，“骄傲男孩”（Proud Boys）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游行示威活动就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州。<sup>②</sup> 另一方面，整体而言，年龄更老的白人往往更加珍视“种族纯洁性”，而更为年轻的白人则因成长背景而对种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更加开放。<sup>③</sup>

四是少数族裔因“漂白”机会差异而日渐分裂。种族多样化发展使潜藏的种族等级制和不同族裔“漂白”机会的差异暴露无遗。整体上，拉丁裔由于肤色、血统及文化等拥有更多的“漂白”可能，亚裔的“模范族裔”称号事实上意味着其牺牲了部分“漂白”机会，非洲裔则普遍受制于“天生的标签”。<sup>④</sup> 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是拉丁裔日益倒向共和党，而非洲裔则仍坚定支持民主党。以拉丁裔男性选民为例，在2016年大选时，支持希拉里比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多31个百分点，2020年大选时支持拜登比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多23个百分点，但在2024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却比支持哈里斯的选民多10个百分点。<sup>⑤</sup>

第二，阶级冲突日益突出。2024年美国大选再度表明，经济仍是绝大多数选民的首要关切。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社会不仅面临严峻的经济不平等，而且正经历历史性的阶层分化与重组。

一方面，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正处于近一个世纪以来的高点。从个人收入来

---

育研究》2024年第3期，第67—76页。

① 于展：《民权运动与美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变迁》，《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15辑，2018年，第49—50页。

② “Riding the Tide: The Shifting Identity of the Proud Boys Since the Capitol Riot,”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and Event Data, December 14, 2023, <https://acleddata.com/2023/12/14/riding-the-tide-the-shifting-proud-boys-identity-since-the-capitol-riot/>.

③ 魏南枝：《美国的文化认同冲突和社会不平等性——种族矛盾的文化与社会源流》，《学术月刊》2021年第2期，第86页。

④ 潘亚玲：《美国种族关系的演变与种族等级制的建构》，《世界民族》2022年第1期，第10—23页。

⑤ Zachary B. Wolf, Curt Merrill, and Way Mullery, “Anatomy of Three Trump Elections: How Americans Shifted in 2024 vs. 2020 and 2016—Exit Polls Reveal a Divided Country,” CNN, November 6, 2024, <https://edition.cnn.com/interactive/2024/politics/2020-2016-exit-polls-2024-dg/>.

看，占人口 1%的群体的平均年收入高达 130 万美元，而其余 99%的人口的平均年收入仅为 5 万美元，前者是后者的 26 倍。从历史角度看，1%年收入最高的人占美国人年收入总额的比例处于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的最高点，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 2 倍多。<sup>①</sup> 从家庭收入来看，2024 年，10%最富有的家庭的平均资产达到 690 万美元，占美国家庭总财富的 67%；而最底层的 50%家庭的平均资产仅为 5.1 万美元，仅占美国家庭总财富的 2.5%。<sup>②</sup>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社会不平等与种族因素紧密相关，或者说种族不平等的情况在经济上的表现尤其明显。2024 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显示，白人家庭的平均资产为 132 万美元，而非裔裔为 30.7 万美元，拉丁裔仅为 24.8 万美元；从不同族裔的家庭资产占美国家庭总财富的比例来看，白人家庭占比高达 84.1%，而非裔裔和拉丁裔的比例分别为 3.4% 和 2.3%。从历史角度看，自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白人家庭资产平均增长 63%，而非裔裔和拉丁裔家庭资产分别增长 51%和 61%；由于基数差距较大，种族性不平等事实上是加剧了。<sup>③</sup> 从贫困发生率来看，2022 年美国整体贫困发生率为 11.5%；但不同族群差异明显，白人和亚裔最低，仅为 8.6%，拉丁裔为 16.9%，非裔裔为 17.1%，最为困苦的是土著人，贫困发生率高达 25%。<sup>④</sup>

另一方面，比经济不平等更糟糕的是，美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阶层分化与重组。美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呈现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二是中产阶级地位下降、人数减少；三是阶级固化、底层向上流动无望。<sup>⑤</sup> 首先，美国社会正呈现出从中产阶级占多数的 W 型社会，向贫富分化明显的 M 型社会转型的趋势。<sup>⑥</sup> 1971—2019 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收入在

---

①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https://www.epi.org/multimedia/unequal-states-of-america/?gad\\_source=1&gclid=CjwKCAiAjKu6BhAMEiwAx4UsAu3BDAYPG\\_YuN3OJU68Z0VOBBuTDx7PXyHGNXly6BH26rSz7QvKUTXoCvKIQAxD\\_BwE#/United%20States](https://www.epi.org/multimedia/unequal-states-of-america/?gad_source=1&gclid=CjwKCAiAjKu6BhAMEiwAx4UsAu3BDAYPG_YuN3OJU68Z0VOBBuTDx7PXyHGNXly6BH26rSz7QvKUTXoCvKIQAxD_BwE#/United%20States).

② Ana Hernández Kent and Lowell R. Ricketts, “The State of U.S. Wealth Inequalit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October 22, 2024, <https://www.stlouisfed.org/institute-for-economic-equity/the-state-of-us-wealth-inequality>.

③ Ibid.

④ Joseph Dalaker,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2022,”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April 29, 2024,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8055/3>.

⑤ 倪峰等：《美国综合国力及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趋势》，时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2—23 页。

⑥ 有关这一社会转型的讨论可参见：[日]大前研一：《M 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刘锦秀、江裕真译，中信出版社 2015 年版。

美国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从 61% 降到 51%；同一时期，高收入家庭所占比重从 14% 增至 20%，低收入家庭也从 25% 增至 29%。<sup>①</sup> 其次，美国中产阶级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迅速萎缩。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去工业化进程，导致曾是美国经济支柱的白人工人阶级面临严重冲击，其数量从 1975 年时占美国成年人口的 70% 下降至 2018 年的 40%。<sup>②</sup> 与之相应的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严重下滑：1989—2016 年，白人工人阶级的年收入在美国人年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 45% 降至 27%。<sup>③</sup> 最后，在中产阶级面临阶级地位下滑风险的同时，居于社会底层的群体却面临日益严峻的阶层固化。严重的贫富差距和中产阶级的萎缩改变了美国“橄榄型”的社会阶级结构，并使之演变为“葫芦型”社会阶级结构。<sup>④</sup> 其结果是，阶层分化与重组催生了底层而非上层的阶级冲突，并成为共和党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政治操纵的重要抓手。

第三，代际冲突影响深远。尽管这是一个自然的年龄增长问题，不同代际因成长背景不同而在政治、社会、经济乃至生活上的态度迥异。在全球性技术革命推动下，代际冲突并不像代际划分那样界限分明，更多是受信息技术影响更大的千禧年世代和 Z 世代与成长于技术不够发达的 X 世代和婴儿潮世代之间的物质与非物质性冲突。<sup>⑤</sup>

① Juliana M. Horowitz, Ruth Igielnik, and Rakesh Kochhar, “Most Americans Say There is too Much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U.S., But Fewer than Half Call It a Top Priority,”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9, 2020,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0/01/09/trends-in-income-and-wealth-inequality/>.

② William R. Emmons, Ana Hernández Kent, and Lowell R. Ricketts, “The Bigger They Are, The Harder They Fall: The Decline of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Essay No. 3, September 2018, [https://www.stlouisfed.org/-/media/project/frbstl/stlouisfed/files/pdfs/hfs/essays/hfs\\_essay3\\_2018.pdf?la=en](https://www.stlouisfed.org/-/media/project/frbstl/stlouisfed/files/pdfs/hfs/essays/hfs_essay3_2018.pdf?la=en).

③ Sarah A. Donovan and David H. Bradley, “Real Wage Trends, 1979 to 2017,”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rch 15, 2018,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5090/10>.

④ 牛霞飞：《左右之战：当代美国政治极化的社会文化根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2 年第 3 期，第 15 页。

⑤ 以美国人口统计、民意调查、流行文化、历史事件等为基础，皮尤研究中心识别出当前美国社会 5 个最主要的代际群体。每个代际的时间跨度大致相等，即在 16 年到 19 年。这 5 个代际群体具体包括：沉默世代（Silent Generation, 1928—1945 年出生），婴儿潮世代（Baby Boomers, 1946—1964 年出生），X 世代（X Generation, 1965—1980 年出生），千禧年世代（Millennium Generation, 1981—1996 年出生），Z 世代（Z Generation, 1997—2012 年出生）。“The Whys and Hows of Generations Research,” Pew Research Center, September 3, 2015, <https://www.people-press.org/2015/09/03/the-whys-and-hows-of-generations-research/>.

从物质层面看，代际冲突主要与经济下行导致的社会福利资源减少相关。一方面，美国社会也存在明显的代际性不平等。对比不同代际群体在相同年龄（34岁）时的家庭资产（扣除通货膨胀）发现，代际不平等事实上在同步加剧。从绝对值看，X世代家庭资产最少，为22.5万美元；婴儿潮世代略好，为22.6万美元；千禧年世代和Z世代家庭资产最多，均达到29.8万美元。但由于美国社会财富总量持续变化，从相对值（不同代际家庭资产占同期美国家庭总资产的比重）观察的图景完全不同：婴儿潮世代最高（19.5%），接近于千禧年世代和Z世代（9.9%）的2倍，相当于X世代（8.5%）的2.3倍。<sup>①</sup>换言之，婴儿潮世代在34岁时已经拥有较好的经济乃至社会地位，相比之下，X世代、千禧年世代和Z世代均面临较为严峻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福利资源紧张诱发了不同代际的福利资源竞争，已进入或正进入老年的人口更为关注以医疗保健为核心的养老问题，而青年人口则更注重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家庭保障问题。<sup>②</sup>

从非物质层面看，代际冲突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政党认同等身份政治问题。静态地看，不同代际由于出生和成长背景差异而有着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党认同，年轻一代往往更加偏向自由主义一端，而年老一代则多偏向保守主义一端；动态地看，随着年龄增长，所有代际都呈现出从相对自由向相对保守的方向移动的态势。<sup>③</sup>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意识形态倾向往往被简化为党派倾向，即倾向自由主义者更认同民主党，倾向保守主义者更认同共和党，进而得出年轻一代选民往往更支持民主党的结论。但新近的发展表明，上述简化论不乏错误之处，特别是Z世代表现出意识形态与政党认同相互剥离的态势：Z世代选民可能在意识形态上倾向自由主义，但在大选投票时却未必同等地支持民主党。Z世代选民在2016年正式参与大选投票，选民数量达到700万，2020年则达到2400万，2024年超过4000万。在2016年大选中，投票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首投族比支持特朗普的高19个百分点；在2020年大选中，支持拜登的

---

① Ana Hernández Kent and Lowell R. Ricketts, "The State of U.S. Wealth Inequality."

② 周顺：《美国政治中的代际差异与矛盾——表现、原因及影响》，《美国研究》2024年第3期，第146页。

③ Richard Braungart and Margaet Braungart, "Life-Course and Generational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2, 1986, pp. 205-231.

首投族比支持特朗普的高 32 个百分点；但在 2024 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首投族反而比支持哈里斯的高 13 个百分点。<sup>①</sup> 鉴于 Z 世代新选民构成首投族的绝大多数，上述发展说明，美国年轻一代中持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共和党选民可能正在不成比例地增加。

## 二、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国内政治效应

持续加剧的美国社会文化危机正导致美国政治的左右两端均向更为极端的方向移动。自由主义者持续推动身份政治滑向对种族、性别和性身份等的道德恐慌，<sup>②</sup> 但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几乎所有群体都自认为是“弱势群体”以及他们对经济资源和社会地位再分配的呼吁；<sup>③</sup> 与此相对的是，以白人工人阶级为核心的在全球化和技术发展中的“输家”<sup>④</sup> 出于对新人口、新技术、新思想等的焦虑和恐惧，反向利用身份政治塑造自身的“受害者”形象，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sup>⑤</sup> 美国社会文化危机主要通过重构选举地理、巩固政治极化和撕裂国家身份等方式塑造国内政治，从而增加而非缓解美国所面临的民主衰败风险。

第一，通过经济、种族和身份性聚居重构美国选举地理。尽管美国是移民国家，但与其他国家一样，国内迁移仍占据其人口移动的绝大多数。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2023 年共有 2 100 万的 16 岁以上人口迁移，占 16 岁以上人口总量的 7.86%；其中，95% 以上都是国内移民，仅 4.88% 来自国外。在国内移民中，本州内移民占 80.86%，本县内移民占 53.43%。<sup>⑥</sup> 以本州甚至本县为主

---

① “Exits Polls,” CNN, November 23, 2016, <https://edition.cnn.com/election/2016/results/exit-polls>; “Exit Polls,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CNN, November 9, 2020, <https://edition.cnn.com/election/2020/exit-polls/president/national-results>; Zachary B. Wolf, Curt Merrill and Way Mullery, “Anatomy of Three Trump Elections: How Americans Shifted in 2024 vs. 2020 and 2016—Exit Polls Reveal a Divided Country”.

② Mark Lilla, “The End of Identity Liberalism,”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1/20/opinion/sunday/the-end-of-identity-liberalism.html>.

③ 倪峰等：《美国综合国力及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趋势》，第 47 页。

④ 林红：《身份政治与国家认同——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困境及其应对》，《政治学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36 页。

⑤ 赵丁琪：《身份政治的困境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西方身份政治的危机与反思》，《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 年第 5 期，第 116 页。

⑥ “Table 2. General Mobility in the Past Year of Persons at Least 16 Years Old, by Labor Force Status, and by Sex,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and Region: 2023,” U.S. Census Bureau,



的迁移，很大程度上出于这些民众的经济、种族及政治关切，有着重要的选举意义。

经济关切往往是美国选民聚居的根本性动力。二战结束后至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稳定增长使白人工人阶级逐渐变得富有，与此相对应的是白人逃离城市迁入郊区。而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末，白人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随着去工业化进程的扩散而下降，同时少数族裔的经济地位逐渐改善，这使得少数族裔大规模迁至郊区。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白人“反攻城市”现象日渐明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都市日益成为创新、服务和就业中心，这与少数族裔大规模移居郊区相结合，驱使不少白人重返大都市；二是年轻白人积累财富的速度明显放缓，导致其进入或者滞留大都市。基于此，1970—1990 年，美国最大的 50 个大都市区的市中心人口呈负增长（减少 0.4%）态势，郊区人口却增长了 2.2%；但 2000 年后，郊区人口增长速度放缓，而市中心人口增速逐渐上升。<sup>①</sup>

作为移民国家，种族性聚居始终是美国国内人口迁移的重要动力。无论是被分散安置的新移民，还是已然相对固定的老移民，“他乡变故乡”情结都是聚居的重要动机，华裔唐人街、越南裔小西贡、古巴裔小哈瓦那均由此而来。种族性聚居最明显的政治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少数中的多数”选区、县和城市涌现。2022 年，在美国 435 个国会选区中，“少数中的多数”选区已达到 136 个，占 31%；而在 2013 年，这一数字仅为 114 个，占 26%。在短短 10 年时间里，“少数中的多数”选区增加了接近 20%。<sup>②</sup> 种族性聚居中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启动、进入 21 世纪后加速的非洲裔回流美国南

---

December 2024, <https://www.census.gov/data/tables/2023/demo/geographic-mobility/cps-2023.html>.

① Robin M. Leichenko, “Growth and Change in U.S. Cities and Suburbs,” *Growth and Change*, Vol. 32, No. 3, 2001, pp. 326-354; Joong-Hwan Oh, “A Dynamic Approach to Population Change in Central Cities and Their Suburbs, 1980-1990: Crime, Employment, and Spatial Proximity,”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64, No. 2, 2005, pp. 663-681; Arthur Acolin, Richard Voith, and Susan Wachter, *City and Suburbs - Has There Been a Regime Change?* Penn Institute for Urban Research, June 16, 2016, [https://www.penniur.upenn.edu/uploads/media/City\\_and\\_Suburbs\\_%e2%80%93\\_Has\\_There\\_Been\\_a\\_Regime\\_Change\\_web.pdf](https://www.penniur.upenn.edu/uploads/media/City_and_Suburbs_%e2%80%93_Has_There_Been_a_Regime_Change_web.pdf).

② “Majority-Minority Districts,” Ballotpedia, [https://ballotpedia.org/Majority-minority\\_districts](https://ballotpedia.org/Majority-minority_districts).

方，这与南北战争后的非洲裔大规模移居东北地区形成鲜明对比。<sup>①</sup>

身份性聚居主要是政治极化加剧导致选民对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政党认同等要素的关注度日益上升的结果。例如，在 2022 年迁移的人口中，为寻求更好的邻居而迁移的占 12.92%，整体性寻找更佳居住环境的达到 62.77%。<sup>②</sup> 身份性聚居导致美国社区结构正发生重大变化，<sup>③</sup> 使美国政治竞争主要围绕郊区展开，因为城乡选民分布已经相当固化。<sup>④</sup> 例如，特朗普在 2016 年和 2024 年赢得大选时获得的郊区选票均比民主党候选人高 4 个百分点，而 2020 年大选时其得到的郊区选票比拜登少 2 个百分点，这对其输掉连任选举有重要影响。<sup>⑤</sup>

第二，通过联邦、州及政党的多层次极化加剧“对抗政治”。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政治学者曾担忧政治极化水平过低会不利于选民区分两党，也不利于政策辩论。<sup>⑥</sup> 但现在对美国政治极化可能诱发“冷内战”的担忧已弥漫全球。

在联邦层次，极化已从政治机构蔓延至整个社会，从精英政治极化演变为大众情感极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极化程度均持续上升，其中存在两个趋势：一是众议院极化程度明显高于参议院，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二是共和党议员的意识形态右倾速度明显快于民主党议员的意识形态“左倾”速度。<sup>⑦</sup> 进入 21 世纪后，日益显著的精英政治极化逐渐向社会生活渗透，转化为某种程度上与意识形态和政党认同脱节的大众情感

① William H. Frey, “A ‘New Great Migration’ is Bringing Black Americans Back to the South,” Brookings Institution, September 12, 2022,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new-great-migration-is-bringing-black-americans-back-to-the-south/>.

② “Table 13. Reason for Move in the Past Year (Both Collapsed and Specific Categories), by Sex, Age, Race and Hispanic Origin, Relationship to Household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Marital Status, Nativity, Tenure, Poverty Status, and Type of Move: 2023,” U.S. Census Bureau, December 2024, <https://www.census.gov/data/tables/2023/demo/geographic-mobility/cps-2023.html>.

③ 美国社区研究项目（American Community Project）将美国社区重新划分为 15 类县，其中多数依据身份差异确立。

④ 潘亚玲：《美国政党重组中的郊区角色》，《美国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1—25 页。

⑤ Zachary B. Wolf, Curt Merrill and Way Mullery, “Anatomy of Three Trump Elections: How Americans Shifted in 2024 vs. 2020 and 2016—Exit Polls Reveal a Divided Country”.

⑥ Evron M. Kirkpatrick, “‘Toward a more Responsible Two-Party System’: Political Science, Policy Science, or Pseudo-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4, 1971, pp. 965-990; Matthew S. Levendusky, “Clearer Cues, More Consistent Voters: A Benefit of Elite Polariz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Vol. 32, No. 1, 2010, pp. 111-131.

⑦ Christopher Hare and Keith T. Poole, “The Polarization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litics,” *Polity*, Vol. 46, No. 3, 2014, pp. 411-429.

极化，最明显地体现为两党党员和选民的相互厌恶。例如，1994 年时有 16% 的民主党人和 17% 的共和党人不喜欢另一党的党员，但到 2014 年时分别上升至 38% 和 43%。<sup>①</sup> 又如，在 2024 年大选中，两党选民均对本党候选人当选感到兴奋和乐观（96% 的民主党选民和 95% 的共和党选民），同时对另一党候选人当选感到恐惧（93% 的民主党选民和 94% 的共和党选民）。<sup>②</sup>

尽管美国的地方特别是州级政治极化目前尚未获得充分的学术关注，<sup>③</sup> 但这一问题的现实影响已显现。州级政治极化的核心指标是一党同时控制州长职位、州参议院和州众议院多数席位的“三合一”（trifecta）现象。在 2024 年大选前，美国州级政治极化达到 1952 年以来的顶峰，共和党有 23 个“三合一”州，民主党为 17 个，仅 10 个州府会分裂。民主党在 2024 年大选中输掉 2 个“三合一”州，但并未明显缓解州级政治极化。关键原因在于，自 1980 年以来各州的分裂选票持续下降：1980 年时，各州投票支持同一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参议员候选人的选民占比为 59%，而到 2024 年已增至 88%。<sup>④</sup> 州级政治极化对联邦政治有着重要影响。首先，“三合一”现象使党内初选变得远比后续的两党竞争更为重要；其次，一党在人口普查年的“三合一”州的多寡，对随后选区重划的掌控能力和此后 10 年内的选票基础有重大影响；最后，与联邦层次的政治极化往往导致“对抗政治”不同，州级政治极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一党对另一党的压制能力越强，“三合一”现象越可能出现，党派议程也就越容易实施。

随着极化从联邦下沉至地方，从精英延伸至大众，政党政治特别是政党重组正变得日益复杂。美国历史上的六次政党重组基本上由相对单一的危机所驱

---

① “Political Polarization in the American Public,” 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12, 2014,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4/06/12/political-polarization-in-the-american-public>.

② “Exit Polls,” CNN, November 5, 2024, <https://edition.cnn.com/election/2024/exit-polls/national-results/general/president/0>.

③ 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23 年一份关于美国政治极化的详尽文献综述中，完全没有提及州级政治极化。参见：Rachel Kleinfeld, “Polarization, Democracy,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he Research Say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September 5, 2023, [https://carnegie-production-assets.s3.amazonaws.com/static/files/Kleinfeld\\_Polarization\\_final\\_2.pdf](https://carnegie-production-assets.s3.amazonaws.com/static/files/Kleinfeld_Polarization_final_2.pdf).

④ Drew Desilver, “2024 Elections Show more Partisan Splits Between States’ Presidential and Senate Votes than in Recent Past,”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26, 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4/11/26/2024-elections-show-more-partisan-splits-between-states-presidential-and-senate-votes-than-in-recent-past/>.

动，<sup>①</sup>但多重危机相交织似乎正导致当前的政党重组“难产”。根据政党重组衡量标准，<sup>②</sup>自2008年以来的历次大选都有“关键投票”迹象，但新的政党格局始终无法稳定。2008年大选产生了首位有色种族总统，2016年大选推动首位非建制派总统执政，2020年大选貌似扭转了这一趋势，却被2024年大选再度扭转。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共和党从“里根共和党”到“特朗普共和党”的转型，<sup>③</sup>还是民主党在经历拜登退选和哈里斯败选后的全面悲观甚至迷失，<sup>④</sup>都表明政党重组正在发生。

第三，通过建制化/反建制化、国家叙事和“美国例外论”重构或动摇国家认同。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全速步入“后真相时代”，传统上判断信息真假的标准日益陷入困境，使身份政治变得更加敏感。

首先，民主、共和两党对待反建制派的不同态度导致完全不同的“建制—反建制—建制化”互动模式。特朗普两度当选总统象征着反建制派的“杰克逊式起义”的成功，<sup>⑤</sup>更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建制—反建制—建制化”复杂互动的高潮。自2008年以来，草根运动支持在野党的现象迅速凸显其政治重要性。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迅速兴起并对美国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以“不可分割网络”为代表的抵抗运动则为民主党或自由主义议程的推广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拜登政府时期，共和党反对批判种族理论的力量也相当强大。但两党草根反对运动的命运截然不同，共和党方面的反建制力量大多得以建制化，先是茶党后是特朗普；反观民主党方面，声势浩大的草根运动因未得到重视而不了了之。两党反建制派的不同命运或许暗示了美国政治右倾化难以逆转的基本态势。<sup>⑥</sup>

① James E. Campbell, “Party Systems and Realig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8-2004,” *Social Science History*, Vol. 30, No. 3, 2006, pp. 359-386.

② V.O. Key, Jr., “A Theory of Critical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7, No. 1, 1955, pp. 3-18.

③ 李奕昕、王浩：《美国政党政治结构转型及其对2024年大选的影响》，《统一战线学研究》2024年第5期，第171页。

④ Gabriel Borelli, “After Trump’s Victory, Democrats are more Pessimistic about Their Party’s Future,” Pew Research Center, November 22, 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4/11/22/after-trumps-victory-democrats-are-more-pessimistic-about-their-partys-future/>.

⑤ Walter Russell Mead, “The Jacksonian Revolt: American Populism and Liberal Order,”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2, 2017, p. 3.

⑥ 潘亚玲：《“冷内战”与美国政治文化转型加速态势分析》，第53—54页。

其次，新美国独立革命史对既有的国家缔造叙事构成严峻挑战。<sup>①</sup> 身份政治的重要性上升直接催生了白人与非洲裔的正统之争。随着旨在修正美国国家缔造史的“1619 计划”（1619 Project）在 2019 年正式登场，时任总统特朗普启动了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的“1776 委员会”（1776 Commission）并发布《1776 报告》，而该委员会又被拜登在上任总统当日解散。这事实上是围绕美国革命史究竟是遵循多元文化主义还是欧洲定居者逻辑而展开的斗争。<sup>②</sup> 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 CRT）处于这一斗争的核心。对保守主义者而言，在中小学讲授美国种族主义历史意味着颠覆国家缔造史，但自由主义者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美国史。<sup>③</sup> 从 2021 年 1 月至 2024 年 11 月，共有 44 个州提出议案或采取行政措施限制批判种族理论教学，其中 18 个州已将此类举措合法化。<sup>④</sup>

最后，“美国例外论”正遭到前所未有的动摇。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例外论”不时遭遇挑战。例如，奥巴马在 2009 年斯特拉斯堡北约峰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相信“美国例外论”，如同英国或希腊相信其例外论一样。<sup>⑤</sup> 又如，从 1987 年开始，特朗普声称美国“不再伟大”的次数超过 100 次，这也是他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的重要原因。<sup>⑥</sup> 但显而易见，特朗普第一任期并未让美国“再次伟大”，<sup>⑦</sup> 其第二任期甚至可能加速美国的“正常化”进程。

---

① 有关新美国革命史的讨论，可参见：周少青：《美国国家特性的三重面相及当代困境》，《美国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21—26 页。

② 张业亮：《当前美国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对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探索》，《美国研究》2023 年第 1 期，第 10 页；林玲：《“文化战争”将美国社会政治推向失序》，《世界知识》2022 年第 19 期，第 54 页。

③ 有关批判种族理论的讨论可参见：[美]多里安·麦考伊、[加]德克·罗德里克斯：《种族批判理论导论》，陈后亮译，《国外理论动态》2017 年第 8 期，第 32 页。

④ Sarah Schwartz, “Map: Where Critical Race Theory is Under Attack,” *Education Week*, November 1, 2024, <https://www.edweek.org/policy-politics/map-where-critical-race-theory-is-under-attack/2021/06>.

⑤ James Fallows, “Obama on Exceptionalism,” *Atlantic*, April 4, 2009,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09/04/obama-on-exceptionalism/9874/>.

⑥ Niraj Chokshi, “The 100-plus Times Donald Trump Assured U.S. that America Is a Laughingstock,”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7, 201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6/01/27/the-100-plus-times-donald-trump-has-assured-us-the-united-states-is-a-laughing-stock/>.

⑦ 倪峰等：《美国综合国力及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趋势》，第 41 页；谢韬：《美国民主的倒退与霸权的未来》，《国际论坛》2024 年第 5 期，第 4 页。

### 三、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国际政治效应

美国的独特性意味着其社会文化的影响极易传导至国际社会。在国运上升时期，美国相对重视国际责任和国际形象，其社会文化所传递的信息相对积极。随着国家实力相对衰落和对霸权衰落的焦虑上升，美国社会文化危机可能通过外交、市场、移民和观念等多个渠道实现国际输出，形成国际霸权衰落与国内社会文化危机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第一，外交是美国社会文化危机影响国际政治的制度性渠道。在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之前，国际社会仍延续着对美国外交的正常预期。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外交的“两个特朗普”现象，<sup>①</sup>推动美国社会文化危机迅速通过“反外交”和“愤懑外交”传导至国际社会。

从其性质看，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外交事实上是“反外交”的，当然也有循规蹈矩之举。特朗普的“反外交”根本上源于其追求“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美国优先”战略，当然也有缺乏经验的原因。在战略和政策层面，“美国优先”战略意味着美国不接受“国际社会”概念，通过牺牲包括其盟伴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利益来追求美国的“再次伟大”，<sup>②</sup>特别是在执政初期对中国和其传统盟友发动近乎无差别的“贸易战”。在外交习俗和礼仪方面，特朗普往往不守规矩，诸如开会迟到、挤占位置、创新“推特外交”等。尽管对特朗普的“反外交”存在诸如胁迫外交、修正外交、自主性等多种解释，<sup>③</sup>但这反映了一种“蛮权力”逻辑。<sup>④</sup>而在外交信念方面，特朗普更是视外交为商业交易。如同冷战时期一样，虽然美国以守成国家自居，但其事实上是最大的修正主义国家。<sup>⑤</sup>

① 陈雪飞：《美国的原则现实主义外交战略》，《东方学刊》2022年第1期，第48页。

② Frank-Walter Steinmeier, “Opening of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Der Bundespräsident, February 14, 2020, <https://www.bundespraesident.de/SharedDocs/Reden/EN/Frank-Walter-Steinmeier/Reden/2020/02/200214-Munich-Security-Conference.html>.

③ 刘飞涛：《胁迫式外交：战略竞争时代美国对外战略的转型》，《和平与发展》2020年第2期，第17—39页；陈琪、柳惊耀：《国际规则视角下的修正主义：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分析》，《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69—96页；李志永：《政策自主性与美国退群外交》，《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4期，第125—155页。

④ 赵晨：《特朗普的“蛮权力”外交与美欧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73—83页。

⑤ 时殷弘：《新趋势·新格局·新规范》，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385页。

特朗普的“反外交”整体上源于民粹主义者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充斥着“讽刺和矛盾”。<sup>①</sup>早在 2016 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就反复表达他对美国外交现状的强烈不满。他多次声称，“很多人已厌倦看到其他国家欺骗美国。他们在背后嘲笑我们。他们嘲笑我们，是因为我们愚蠢”。<sup>②</sup>基于强烈的愤懑情绪，特朗普执政后立即将“退群”、制裁、威胁等非常规手段当作主要工具。特朗普将其“反外交”和“愤懑外交”标榜为“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事实上，“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在诸多方面与经典现实主义存在共识，进而使“美国优先”战略得以正当化。例如，2018 年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讲中声称，“美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政策意味着，我们不会再被陈旧教条、不可信的意识形态及所谓的专家所绑架，多年来，这些一再被证明是完全错误的”。<sup>③</sup>而且，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政府的外交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基于以下假设，即“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是以美国的损失和霸权衰落为代价的。<sup>④</sup>

第二，逆全球化是美国社会文化危机影响国际政治的市场性渠道。冷战结束后，美欧曾极度欣喜，不仅因为“民主”世界的“胜利”可能带来“历史的终结”，而且因为全球市场统一才是建构美国“单极世界”的物质基础。但全球市场统一带来的红利似乎没有达到预期，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加深实际上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赶超的机遇。与“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步入展开期的成熟阶段有关，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有效抓住体系性的超越机会窗口，实现了国力的重大提升。<sup>⑤</sup>这与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相结合，塑造了一个全然不同于冷战结束之初的国际权势对比格局。这一次，美国衰落

---

① Michael Kazin, *The Populist Persuasion: An American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

② “Trump has Long Believed America is a Victim of International Trade,”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rch 6, 2018, <https://www.npr.org/2018/03/08/592046329/trump-has-long-believed-america-is-a-victim-of-international-trade>.

③ Donald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to the 73rd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White House, September 25, 2018,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73rd-session-united-nations-general-assembly-new-york-ny/>.

④ G. John Ikenberry,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an the Liberal Order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Vol. 96, No. 3, 2017, p. 2.

⑤ Carlota Perez,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Techno-Economic Paradigm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34, No. 1, 2010, pp. 185-202; [英]卡萝塔·佩蕾兹：《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田方萌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五章。

似乎是真的。<sup>①</sup> 尽管围绕美国衰落的争论不断，但美国战略界在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事实上已将衰落管理作为其战略决策的重要前提。<sup>②</sup>

与奥巴马政府仍坚持在既有全球化和相互依赖框架内追求霸权衰落管理目标不同，特朗普意识到，不彻底改造全球化，美国难以重新拥有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最大回报的能力。因此，特朗普执政后迅即启动逆全球化进程。在经济方面拥抱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不仅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也针对其盟伴国家采取贸易强制措施、重新谈判自由贸易安排；在政治方面奉行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退出各类其认为不利于美国的多边合作框架；在社会文化方面推行种族主义和孤立主义，不仅限制移民，还修建美墨边境墙，限制与各国的人文交流。

逆全球化思潮与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获利能力下降和美国国内社会文化危机紧密相关。不同群体对在全球化进程中或赢或输的认知差异，特别是美国中产阶级萎缩、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等，导致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深化可能激化了美国的逆全球化思潮和社会文化矛盾。因此，逆全球化是特朗普政府在“全球化不可能三角”中选择付出较小代价政策的结果。<sup>③</sup> 逆全球化本质上是再全球化，美国的核心目标是阻止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赢家，并使美国重新成为最大的赢家。事实上，无论是特朗普第一任期还是拜登政府，都试图通过不同程度地放弃二战后的国际责任，将资源集中到美国本土，从而为其本国民众提供更多的繁荣和安全。<sup>④</sup> 美国推动逆全球化的目的是通过重塑全球化进程，从而有效管理霸权衰落，缓解自身的社会文化危机。

第三，国际移民是美国社会文化危机影响国际政治的人文性渠道。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国际移民是美国与国际社会交流与沟通最便捷的桥梁，同时也是美国拥有的独特优势。国际移民联系美国与故土的最重要手段是族裔游说，一

---

① Gideon Rachman, "Think Again: American Decline - This Time It's for Real," *Foreign Policy*, No. 184, 2011, pp. 58-63.

② 潘亚玲：《应对霸权衰落：美国中长期战略前瞻》，《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45—60页。

③ 孙天昊、盛斌：《墙还是梯子？——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冲突与特朗普政府的选择》，《美国研究》2019年第4期，第21—26页。

④ 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67—69页。



方面是在美国为故土利益游说，另一方面也在故土为美国游说，即向故土推广和介绍美国的观念、政策等。尽管美国国内对族裔游说存在诸多担忧，特别是担心国际移民可能会因此牺牲美国的利益，但也有很多人坚持认为，出于对美国外交背后道德指南的信仰，国际移民有助于美国在海外推广自己的价值观。<sup>①</sup>在美国内部深陷于社会文化危机之际，国际移民向其故土及更大的国际社会传递的信息可能是混杂的。这也意味着，国际移民也可能将美国内部的社会文化危机传播到世界各地，其结果是不仅会暴露美国内部的种种问题，而且有可能会诱发、激化国际社会的迷茫、矛盾、动荡甚至冲突。

如果说族裔游说向国际社会传播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影响充满不确定性，那么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国际移民传播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效果极有可能是消极的，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无论是在 2024 年大选期间还是在特朗普获胜之后，决定移居海外的美国明星和富豪均大幅增长，这意味着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充分显现。<sup>②</sup>其次，特朗普极可能重启其第一任期对外来移民的限制举措，不仅为外国移民进入美国设置重大障碍，而且也可能导致大量已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被遣返。无论何种情况，这些移民都可能基于对美国的消极印象，相对偏激地传播有关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信息。最后，特朗普也可能延续其第一任期的战略竞争逻辑，并在拜登政府的基础上升级或调整主要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或“新冷战”，结果是不断升级针对部分国家的人文交流限制。例如，特朗普政府曾于 2018 年启动所谓“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导致数百名美国科学家遭调查和起诉，其中多数是华裔。这不仅遭到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并最终被拜登政府终止，也促使大量华裔科学家重返中国。<sup>③</sup>因此，如果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加大对与中、俄人文交流的限制力度，可能导致更多华裔和俄裔美国人回流，并对中、俄有关美国社会文化危机的认知产生显著影响。

最后，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是美国社会文化危机影响国际政治的

---

① Yossi Shain, *Marketing the American Creed Abroad: Diasporas in the U.S. and Their Homelands*, First E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83-84.

② Jessica Acosta and Elisabeth McGowan, “Which Celebrities are Leaving the Country after Trump’s Election Win?” *Hollywood Life*, November 21, 2024, [https://hollywoodlife.com/feature/which-celebrities-leaving-country-trump-win-5344197/#google\\_vignette](https://hollywoodlife.com/feature/which-celebrities-leaving-country-trump-win-5344197/#google_vignette).

③ 万晓宏、林岳明：《美国“中国行动计划”的演进和后果评析》，《当代美国评论》2024 年第 1 期，第 25—45 页。

观念性渠道。一方面，美国自二战以来所拥有的世界霸权、经济优势及移民网络，为其社会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奠定了坚实的物理基础。另一方面，美国在冷战后引领的信息技术革命使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社区快速发展，为美国社会文化的全球性传播奠定了快捷的网络基础。而“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为虚拟社区的繁荣提供了合法性支撑，导致真相极可能取决于信仰而非信息。在“后真相时代”，真相与谬误不再是具体事例的属性，而是一种集体劝说现象。真相演变为一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针对个体的行动与结构性倾向相结合的网络体系和共识机制。或者说，在当下的美国，真相事关如何成功地让个体接受结构性或体系性的共识，它事实上是一种劝说机制。就个体接受共识而言，私下的动态劝说比公共的固定说教更为有效。<sup>①</sup>这使得超越国界且因志趣相投而形成的虚拟社区在美国社会文化传播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

尽管虚拟社区可能使美国社会文化的传播更为便利和快捷，但它并不甄别信息质量。随着美国社会文化危机加重，虚拟社区在放大和扩散危机方面的消极效应也会随之增强。美国独特的国际地位和强大的物质能力，使其内部稀奇古怪的思潮在世界各地都存在追随者。例如，特朗普在美国存在高度争议，却在欧洲不少国家被人效仿。特朗普 2016 年当选总统后，一度引发欧洲对“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广泛担忧。特朗普 2024 年再次当选总统后，其独特的舞步又迅速流行开来。又如，在美国国内存在高度争议的性别和性身份问题，也正在国际社会传播。这意味着美国的社会文化危机也极有可能通过虚拟社区传播至全球。

还应看到的是，由于真实的国家边界效应，美国国内相互冲突的社会文化要素在经由虚拟社区传播至全球各地后，其对抗性可能因此而降低。当然，如果相互冲突的社会文化要素经由虚拟社区传播至同一政治空间，则可能导致美式社会文化危机的“全球化”，使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思潮呈多样化发展，为相应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治理平添诸多困难。

---

<sup>①</sup> Clare L.E. Foster, “Truth as Social Practice in a Digital Era: Iteration as Persuasion,” *AI & Society*, Vol. 38, No. 5, 2023, pp. 2009-2023.

## 结 束 语

需要看到的是，美国内部仍有不少人对其社会文化危机有着深刻的认识。早在 2016 年，美国就有超过半数的普通公众意识到需要一位能“打破常规”的强势总统。<sup>①</sup> 这可能是特朗普在尽管争议不断的情况下，仍能两度当选美国总统的深层原因之一。特别是美国 2024 年大选某种程度上是对特朗普的“信任投票”。在他赢下所有摇摆州的同时，已“特朗普化”的共和党不仅赢得参众两院多数，还在州级选举中小有斩获。<sup>②</sup> 尽管截至目前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内阁成员的选择多出人意料，但仍可能迎合众多普通民众对“强势且愿意打破常规”领导人的期待。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极有可能在其第二任期倚仗府会一致强势推进“杰克逊式革命”，尝试为应对美国社会文化危机采取自上而下的系统性方法。当前的主要迹象是由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DOGE）或将彻底推翻根深蒂固的深层政府（deep state）。如果这一政治改革努力获得成功，美国的社会文化危机有可能在短期内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由于这仅代表部分美国人的吁求，因此它极有可能仍是延续“对抗政治”而非重振“共识政治”，其结果可能是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加剧既有的社会文化危机，而非“让美国再次伟大”。

[责任编辑：陈 雪]

---

<sup>①</sup> Betsy Cooper et al., “How Immigration and Concerns about Cultural Change are Shaping the 2016 Election | PRRI/Brookings Survey,” 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June 23, 2016, <http://www.prrri.org/research/prri-brookings-poll-immigration-economy-trade-terrorism-presidential-race/>.

<sup>②</sup> Louis Jacobson, “Republican Success Continues in State Legislative Races,” *U.S. News & World Report*, November 8, 2024, <https://www.usnews.com/news/national-news/articles/2024-11-07/republican-success-continues-in-state-legislative-races>.